

勝利回到北平

吳鑄人回憶錄之六

● 吳鑄人原著 · 王成聖校訂

放不下人情的包袱

抗戰期間我任職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處又名第三處。勝利後有一天侍從室人事處主任陳果夫問我：「最近你已為許多同志安排了職務，你有沒有給自己留心一個合意的工作呀？」我說：「我的職務安排一切聽執政黨中央。黨希望我到那裡去服務，我就去那裏服務。」陳果夫說：「你總有自己的打算吧。」我說：「八年來沒有對父母盡過一天的孝道。我希望黨能安排我到南京去工作，離家近一點。工作最好不是太忙的，待遇好一點，最好能有住處和車子，能讓我在父母身上盡兩年的孝。兩年後即令黨派我再苦的差事我都會心甘情願的去努力。」陳氏說：「有個好差事。農業金融設計委員會改隸中國農民銀行了，由我兼主任委員，如果你讚成，就請你來作個常務委員兼副主任委員。」我說：「那太好了，謝謝您！我在英國學的就是農業經濟，正好學以致用。」

就在民國三十五年重慶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散會後，中央黨部秘書長

吳鐵城對我說：「鑄人兄呀！要有遠行了！」我說：「秘書長又開玩笑笑了。有什麼差遣呀！」他說：「我現在有別的事。你晚上到我家來吃晚飯再詳談。」晚上到吳鐵城家。他說蔣中正總裁從北平回來下了個手令，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許惠東另有任用，派吳鑄人同志接任。我聽了對吳鐵城說：「請秘書長轉告蔣總裁這項任務太重大了，我怕不能勝任。」接着我又將自己八年未得盡孝以及果夫先生要聘我任農金設計委員會常務委員的事說了一遍。他說這件任命是蔣中正總裁親自選擇的，並沒有經過別人保舉或中央組織部推薦，所以恐怕不易改變。接着他說：「過兩天總裁一定會召見你，你不妨自己對他說。」

果然兩天後接到蔣中正總裁召見的消息。見到總裁他對我說：「北平是個文化大城，黨務非常重要。由於你過去和北平文教界有淵源，自己又是北大畢業的，在黨務工作上也很有經驗，我想你會作得很好的，可以負得起市黨部主委的責任。」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說給他聽。他聽後說：

「北平的氣候環境全很好，就把你老太太帶去接去奉養，也讓他們開開眼界，不更好嗎？」總

裁既然這麼說，我只好從命了。

我之敢於接受這項任命，有以下三個先決條件：第一，勝利後，中共軍頭朱德發電要獨立接受日本之投降，不聽中央指揮。在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會議召開之前，我們在重慶把黨和團的幹部召集了起來，搞了一個革新運動。目的在促成黨團一致、文武合一以防止中共的擴大叛亂。我被選為總幹事，在黨團之間起了很大的協調作用，大家合作得很好。這層黨團優良的合作關係，將有利於北方黨務的推動。第二，我在第三處任通訊處處長多年，認識黨政同志極多，此外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及高級班畢業學員去河北的人很多，他們將會對我的工作有幫助。第三，自民國十六年到民國十九年我從事河北基層黨務工作，人際關係良好，同時出身北大，認識文教界的朋友不少，必要時多會有所照應。以上這些條件，是我敢於接下北平市黨部主委這項任命的真正因素；恐怕也是蔣總裁發出這一派令的主要理由。

記得剛勝利不久，有一天陳果夫與我談天，他說中央決定派許惠東作北平特別市黨部主任委

員，郝仁伯為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我當即表示這兩項任命全不妥當。陳氏問我原因。我說：「依我對北平的了解，黨務應當給有文教經驗的同志去負責，許惠東不合適；關於郝仁伯，雖然善於交際應酬，但不務實，有政治野心而無理想，天津工商重鎮，黨務交給他也不合適。」陳果夫聽我說的有理，立刻與中央黨部通了電話，叫他們將兩項任命慢慢發表。後來余井塘來對陳果夫說，中央的決定已告訴了許、郝兩位同志，不便更改了。於是只好算了。

中國政治之所以不上軌道，就是人們在大非的面前放不下人情的包袱。這也是中國政治人物最可悲的地方。

我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從重慶到北平的。身邊沒帶任何人。身上穿的仍是那套抗戰時期的中山裝。同機的有接任北平市長的熊斌。市長有隨從，快到北平時他問我可有人來接，我說有。

在我動身的前幾天，曾寫信給老友崔子信和翁祿山。果然他們都到機場來了，同時好友賀翊新也來了。見面大家很高興。他們問住在什麼地方好，我說隨便，結果暫時安排在河北省黨部的一間宿舍。問我晚上想到那裏去吃飯，我說找一個小館子就行了。

結果當晚在西單牌樓一家北方館子用餐。我點了個青炒蝦仁，一個蛤蜊鯽魚湯，另外配了兩道素菜。之所以叫青炒蝦仁，是八年在四川吃不到這道菜。吃得很清爽。晚上聊聊天，回北平的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到北大看望老工友

到北平後，我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帶着感恩的心到北大去看望當年照顧我的工友。時隔二十年，他老多了。我請他告訴所有當年的老工友，帶着家人，於某日來市黨部，我請大家吃飯。到了那天，大小來了六十幾位。一共開了四大桌。大家相聚，歡歡喜喜談了些昔日往事。走時每家送一萬元法幣。對這些老朋友，我內心一則感念他們過去所給予我以及其他革命黨學生的掩護照顧，一則想到將來還有藉重之處。北大不只在北平市，就是在全中國也具備一定程度上學術、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影響力，而一個大學是否能安定成長，它的教職員及學生固然可以發生影響力，它的工友們在許多方面也形成安定的因素。我作黨務工作的重點就是從基層着眼，由點而面，照顧到社會上各個階層。基本上國共兩黨的不同就在於共黨只強調無產階級，只為無產階級謀福利，國民黨重視全民福利，因此重視階級協調。這件事以後，我又與當時北大先修班主任陳雪屏協調，把許多教師們請來市黨部聚餐坐談。我向他們強調，過去政府由於力不從心，不能把每一位學人都轉移到後方去，使各位含垢忍辱達八年之久，十分對各位不住。今後黨部的大門是開着的，隨時歡迎大家來交換意見，一致為國家建設而努力。當時就有二百多人表示願意入黨。我說：「凡樂於加入國民黨的，我吳鑄人願意作各位的介紹人。」

到市黨部服務所遇到的第一個大麻煩是全市

中學老師為了待遇等問題先是向市政府請願無結果而醞釀罷教，同時又派代表來市黨部請願。我在了解問題之後立刻與市政府熊斌市長協調，成功的把問題解決了。這件事的順利解決，產生了一連串好的影響：第一，全市中學教員不下三千人，一旦罷教，受影響的是十多萬學生和家長。問題的解決，使他們北平市的中產階級產生對政府及國民黨的信心和向心力。第二，使共黨的陰謀無法實施：事件發生後，共黨大學生們即揚言要在師大開會支援罷教行動。第三，使黨部及我個人的聲望得以在行轅主任李宗仁、市長熊斌心目中提高信任度。

接收大員失落民心

在重慶感受不到我們勝利後復員工作的缺失。到了北平才深深感受到這些缺失使我們喪失了太多的人心。其中最失人心的措失，就是所謂的處置「漢奸」問題。什麼「文化漢奸」、「經濟漢奸」、「偽北大」、「偽教授」、「偽學生」；搞得收復區無人不「奸」無人不「偽」，結果是人人自危。最後誰得到了好處？中共。其實主張擴大處置「漢奸」本身就是中共的一大陰謀。抗戰末期，我在委員長侍從室通訊處處長任內，經核准曾召集內政部長雷殷，中央政校大學部政治系主任薩孟武及其他農經專家共十人，加上陳果夫和我正好一桌飯，大家就未來復員問題進行研究。這項聚會的背景是當廣西南寧收復後，中央派內政部長雷殷前往視察，發現日軍撤走後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很多。例如家庭問題、

日軍強佔有夫之婦，日軍走後原夫家不肯收容被強佔之婦女，耕牛問題——日軍將耕牛屠殺或帶走。我們先就雷殿次長的報告擬出二十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戰後漢奸之處理」以及「戰後偽軍之處理」。依這二十個問題我們作成問卷分寄前方各接近淪陷區的縣長、行政督察專員、校長，請他們就自己親身經歷和觀察提出解決方案。收回問卷約八百份。有許多意見是非常寶貴的。由錢範宇同志負責整理，然後分呈陳果夫主任及蔣中正委員長過目。委員長看得很仔細，許多地方加了眉批。最後裝訂成了一本小冊子叫「淪陷區收復後之問題及其解決辦法」。那時這小冊子早已散失，但關於漢奸問題的處理記得是這樣建議的：一、對漢奸頭目要明正典刑，以對全國人民及歷史有所交代——這些頭目包括南京及北京偽政府的領導人，總共也不過十個八個人。二、政府當召告淪陷區人民：由於政府力不從心，使同胞含垢忍辱八年之久，今後人不分南北東西一視同仁，團結一致來重建家園。後來委員長作了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併入文官處，小冊子也不知弄到那裡去了。勝利後復員工作由以下幾個人給蔣中正委員長出主意：中央設計局的熊式輝負責漢奸問題的處理，王世杰負責對俄外交，張治中、張群、吳鼎昌負責與中共打交道。

在中外歷史上，對處理類似「漢奸」的問題有許多良好例子，近如法國政府對貝當的安排，遠者如我國春秋時晉重耳復國後對勃鞞、頭須等叛員的寬大，三國時曹操當群官之面焚燒通敵者之密函。勝利後，對這一切我們全視若無睹，偏偏像中了邪似的要對漢奸問題窮追不捨。擴大嚴辦追根揭底，我們還是中了中共的陰謀：勝利時，中共在香港大公報一天到晚叫着要申張民族正氣，就一定要把漢奸滴水不漏的清除乾淨。對於收編偽軍問題，左派報紙也極力反對。當時潛伏在政府中的劉斐就是主張嚴懲漢奸，反對收編最力的軍官。我們的負責同志不查究竟，許多就上了中共的圈套。對漢奸問題採取了擴大懲處的辦法。結果「文化漢奸」、「經濟漢奸」弄的淪陷區人人自危，失去了多少人心！我們勝利所接收的，是一個勝利的空架子；可悲的是淪陷區的人心卻被我們拒收了。這是在大陸上失敗的主因之一。

處理漢奸問題之不當也發生在北平市。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傷害減到最少。請北大上自教授下至助教來黨部吃飯坐談，是我化解所謂「文化漢奸」、「偽教授」的第一步。在和先修班主任陳雪屏作事先協商時我就表示：我們勝利之後不承認學生八年的學籍已經太過份了。學生們無罪，先生們無罪，是政府對不起他們。我們不能保護自己同胞不受日本人的侵略欺辱，反將受害者給予不名譽的懲罰，這是絕對不公平的。後來在聚餐時，我也表白了相似的觀點。「文化漢奸」的歪風，源自第六屆重慶教育會議之時，像朱家驊（駱先）及傅斯年（夢真）等人就在會上鼓吹勝利後要嚴懲各界各類的漢奸。勝利後在北平被打為文化漢奸的藝人很多。罪名不外他們到過偽滿洲國去表演過藝術歌舞劇等。

有一天戲劇公會張君秋、葉盛章等來看我，說馬連良因去偽滿唱戲，被指為文化漢奸，關了好久還沒釋放。我為這事去找行轅主任李宗仁，他說是戴笠（雨農）負責。我去找戴笠，戴說是馬漢三承辦的。與馬漢三見面後，他要我寫封信。我說我不但寫信，我還可以給馬連良作保。他說那太好了。我又問他另一個平劇藝人李萬春為什麼關起來？他說李萬春是川島芳子的乾兒子。我說：「這絕對不是李萬春主動巴結的，而是川島芳子看上了李萬春的才貌，強收李萬春作個義子，實際上是川島芳子要嫖李萬春而設下的一個可以隨時接近的名目。」馬漢三說：「那就請主任委員一併保釋吧。」我說：「那是一定。不過你得為我作個見証，不要以後弄出個「吳鑄人包庇文化漢奸」。革命黨人不怕負責，要有擔當，可是也要周詳。」馬漢三沒有異議。馬連良、李萬春因此才獲得釋放。好些藝人來黨部致謝。謝不謝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舉為國民黨在北平市贏得了好感。北平市民的主要精神食糧是平劇。把名伶扣壓起來等於把嬰兒的奶媽關了起來，那他不怨你？

所謂的「經濟漢奸」就是敵偽時期和日本人或偽政府有過商務往來的人。人民寄在敵人的槍口刺刀下，不得已為了生活而和敵偽發生商務關係，何罪之有？我曾多次批評「經濟漢奸」一辭的不當和政府處置問題的不合理。

中共通緝令我快慰

我在北平任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兩年八個

月，不斷與中共抗爭，之所以沒有吃虧，自問，主要得力於黨務基層工作做得還算紮實。我一生最大的光榮就是中共一入北平城即宣布我為戰犯。當我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刻發表談話：「我認為這是我的光榮，證明我在與共黨鬥爭上還算成功，要謝謝毛澤東送我這個歷史禮物！今後不論在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黨史上，都會有我吳鑄人這三個字。」的確，全國七八十個市黨部主任委員，只有我吳鑄人被中共通緝為戰犯，真令我快慰。

西北大共謀張治中

勝利後，與「嚴懲漢奸」同時推行的政策就是拒絕收編偽軍。負責我們和中共打交道的要人物之一的張治中本身就親共。共方的策略是：一方面鼓動政府不要收編偽軍，一方面暗中將偽軍收買為中共出力。民國三十五年某日陳果夫對我說我們西北一定有個大共謀。我問他怎麼知道。他說有情報說有人從西北匯大筆的錢到香港去運用來收買我們沒有收編的偽軍並轉送去西北。當時並不知道這個大共謀就是張治中。

抗戰時期中共在延安，只辦了一些短期訓練班，也沒有軍事學校，後來它軍隊那麼多，那裏來的？林彪帶千人出關，後來組成龐大的軍事力量，主力是收編了皇協軍。政府不要皇協軍，他們就被林彪收了去。江蘇偽軍將領郝鵬舉投向中央，因為我們排斥他，說他是「偽軍頭」，結果他去作了土匪，而他留下的軍隊多數為陳毅所收編。

我在重慶時，有一天見到軍政部部长陳誠（辭修）。我說：「辭公啊！偽軍不收編的現行政策恐怕要修正了。」他不以為然的反問：「修正什麼？」我說：「偽軍今後只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投歸中央，第二投向共產黨，第三去作土匪。如果我們不收編，他們勢必走上第二第三兩條路，這對我們可能造成極大的後患。」他說：「這些楊梅瘡叫共產黨去害去好了。」我笑着說：「現在有六〇六、九一四可以治療楊梅瘡啊！辭公！如果共產黨把楊梅瘡治好了，可就成了我們的強敵了啊！」結果二人相視無言而散。可歎我們對敵人寬大對自己同胞嚴苛，真是豈有此理。

處理漢奸和拒收偽軍是我們過去失敗的主因。寫在我的自傳中，或者對將來重建大陸的工作有參考價值。

查封國民大戲院案

到職不久，北平發生「國民大戲院事件」。該戲院隸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事件是一位未成年女孩在該戲院票房內被強姦。問題發生後，報紙爭相報導，左派更有意破壞群眾對國民黨的感情。我一看事態嚴重，主張查封該戲院以解除民怨。當時市長熊斌本認為戲院既然隸屬中宣部，就應由中宣部去辦。對與黨務有關的事，我一向的處理態度是：凡對民衆有利的就當盡快去辦；凡對黨譽有損的就當快辦，不必多所顧忌。由於情況急迫，我向熊斌市長承諾負責全責，在未呈報中央之前先下令查封國民大戲院。中宣部部长王雪艇（世杰）知道未經他核准我把國民大戲院給

查封了，很不開心，於是叫我的好友許孝炎到陳果夫處告了我一狀。我最記得陳果夫給我寫的信上是這樣說的：「鑄人兄：今晨孝炎兄來舍，對兄查封國民大戲院多所煩言。弟告以若查封國民大戲院對黨有利，也未始不可查封；查封國民大戲院如對黨不利，則不當查封。鑄人兄乃與本黨共休戚之黨員，依予與鑄人兄共事之經驗，鑄人兄當不致作對黨不利之事也。究竟如何，請兄查明告知。」收到信後我很感觸：老友有時還不能了解我自己的作事精神，所幸還有個知己的老長官。我立刻寫信將實情報告了陳果夫，同時查封一個月後，依查封時的承諾，把戲院又還給了中宣部。對中宣部言而有信，對北平市民有了交代，同時也封住了共黨份子的口。我這一手有如司馬懿當機斬孟達。雖然招致煩言，卻為黨贏得了人心。一個革命黨人和一般官僚的不同就是前者在問題面前一心為公，不計個人的損益。

堅持立場為黨增光

胡適來北平任北大校長，我去機場接他。在車上他對我說以後你要多幫我忙。我說國民黨派我來作北平市黨部主委的主要目的就是為文教界服務。他說：「好，可是你幫我忙可不要把我牽涉到你們政治或黨務裏去啊！你讓我安安心心把學校辦好，就行了。」我說我一定遵從老師的吩咐。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號之前，胡適忽然打電話說：「鑄人啊！今年五四如果你忙就不必回來參加紀念會了。」我問說是不是學生貼標語要「

打倒特務頭子吳鑄人」呀！他說你怎麼知道？我說學生的事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掛上電話後，我想自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去北大，準備叫共黨學生把我打死，一是捲舖蓋辭職走路。結果我選擇了第一條路。

「五月四日」早上八點鐘，我叫司機開車送我到翠花胡同口。

下車後叫司機和副官就在當地等我，不必來接。

於是我獨自一人步行到了北大。那時離開會時間還有十五分鐘。我走到簽名台前在簽名簿上簽了「吳鑄人」三個大字。這時只聽人群中噁噁噁噁：「他來了！他來了！」有許多工友在忙着清洗「打倒特務頭子吳鑄人」「開除吳鑄人校友籍」之類的標語。我一言不發，昂首步入禮堂。

開會時推舉主席，郭登敖非要推舉我作主席不可，我先推辭了一陣，因為到會學長很多，後來也著實想藉這個機會向同學說幾句話，於是就上了台。

記得當時我的話是這樣說的：「今天來到母校參加五四紀念會是我感到最興奮最光榮的一次。為什麼呢？因為五四運動是我北大大學生及先生們所發起的愛國運動。這一運動喚起了中國人的責任感和愛國心。當年是因為巴黎和會要把我山東膠濟鐵路和青島由德國人手上轉交給日本。中國也是參戰國，勝利了，自己的主權及領土不歸還原主反要轉移給另一強權。消息傳來舉國譁然，我北大師生更是憤慨萬千。在運動過程中，北大大同學始終扮演領導者的角色。當年的賣國賊是

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一幫人。由於全國青年人的覺醒，使這些賣國賊不敢在和約上簽字。二次大戰，俄國人曾與我們協手反法西斯，反納粹，反日本軍閥。今天勝利了，俄國人就如同第一次大戰後的日本人一樣，藉着雅爾達條約，要恢復日俄戰爭前在我東北的權利，要租借旅順大連，要管理中東鐵路。同學們，今天我們要發揚五四愛國精神就要把俄國勢力趕出去；要趕走俄國勢力首先要打倒蘇俄所扶植的內奸共產黨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這些賣國賊。」

演說中不斷有人鼓掌。在場共黨學生為數不少，但沒有一個鼓噪的可見愛國之心誰不如我？

會後大家一同巡視校園。走到民主廣場。當我們看到共黨學生貼的海報，我就高聲說：「這種海報標語是為共黨作宣傳的，要不得以後不能貼。」

群眾中也無人起來反對。凡見到愛國親國民黨的海報標語，我就高聲說：

「這個很好。多貼這樣的。」

巡視廣場後回到休息室。這時有幾位學生來見我，請我捐錢。我問捐錢的目的。他們說要建風雨操場。我問一共需多少錢？他們說兩千萬。我說：

「這筆錢就由國民黨市黨部全數認捐。現在市面蕭條，捐款不容易，又耽誤功課。」

他們聽了非常高興。

我接着說：「不過我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在操場基石上要刻『中國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捐建』

十二個字。」

他們都同意了。我就提筆在捐款簿上寫：中國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捐法幣貳仟萬元整。下午回到黨部，秘書高瀾波、金克和跑來對我說：「主委，您這麼大手筆恐怕黨部難以支應。」

我對他們說，花錢就要花在刀口上。兩仟萬算什麼？能在北大校內樹立一個市黨部捐建的基石，就是花兩億也不多。錢立刻先向銀行信用貸款，然後我再想法子還。我當時的想法是先向銀行貸款，再向中央黨部申請，希望陳果夫主持的財務委員會能全數撥付，我就可以用來還銀行。萬一撥不下來，自信這個擔子我還擔得下。

我深知北平是個文化城，文教界一切活動全是看北大的。黨對北平市的青年文化界工作，如果不能在北大立足，其他就不必談了。

晚上胡適來電話，叫我到他家去晚餐。見面他第一句話就說：「鑄人你真了不起。今天你的表現，不愧有我們北大的精神，也為你的黨爭了光，我向你道賀。」

我說：「謝謝胡先生。其實這一切都是逼出來的。我是北大校友，在北平做國民黨市黨部主委，如果因為共黨學生喊着要打倒我，我就連母校也不敢回了，那只有捲舖蓋了。其實若真被共黨把我打死在自己母校，我也會引以為榮的。不過我預料共黨學生不敢貿然下手。」

他們既然看我是特務頭子，特務頭子身邊會沒有保鏢護衛？事實上我是毫無準備，所有治安機關，我一概沒通知。」胡適聽後，關切的囑咐說：「還是要小心點才好。」（待續）